

中原抗战论丛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及其特点·····	刘银生(1)
试论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历史作用·····	张文杰(14)
论中原抗战战略发展方向的转变·····	冯文纲(29)
毛泽东与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陈随源(46)
豫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建的特点及其 历史地位·····	岳鸿亮(61)
试论竹沟抗战基地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乔长泰(69)
浅论永城在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地位·····	刘须明(79)
浅论豫东南抗日游击区的开辟及中止原因·····	项先珍(91)
论党的领导与睢杞太“红旗不倒”·····	王延章(99)
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	郭德欣 张留学(113)
简论豫鄂边区党的建设·····	刘向阳(127)
睢杞太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原因初探·····	刘善魁(136)
试论党对睢杞太抗日根据地领导的历史作用·····	李金轩(152)
隐蔽发展 坚持斗争 ——1941—1943 年睢杞太游击根据地论析·····	赵 俊(163)
试论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对睢杞太地区坚持斗争 的历史作用·····	陈剑江(172)
淮阳部队在睢杞太根据地斗争中的作用 ·····	朱俊杰 王兴明 李文学(187)

西华抗日部队在豫东抗战中的作用和成长原因·····王 珍(193)	
浅谈新四军游击支队鹿邑留守处的历史作用	
·····牛继庆 史效珍(208)	
定陵战斗的历史意义·····李文学 朱俊杰(218)	
杜岗会师的历史意义·····魏 然(222)	
创建华中抗日部队中的“西华方式”·····刘西森 王 燕(227)	
——兼评游击支队对待西华部队的得失	
豫南游击兵团挺进河南意义初探·····罗荣家(240)	
略论豫东地区抗日政权的特点及作用·····石国文(249)	
试述马屯、聚台岗“小后方”的历史作用·····陈文超(260)	
扎根群众 “孤悬”不孤·····郑 植 建 华(267)	
西华人民对豫东抗日根据地的贡献·····王根法(274)	
水东地区人民群众的历史贡献	
——兼论水东地区党政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孙继书(283)	
关于“耿吴刘叛变”原因的探讨·····王传新(292)	
“耿吴刘叛变”争议问题浅析·····侯永之(300)	
团结友军，共同抗战	
——新四军四师对何柱国等部的统战工作·····张学忠(309)	
试析抗战初期中共党组织对李德纯的统战工作·····沈金兰(322)	
豫鄂边抗日根据地统战工作的基本经验·····贺明洲(337)	
豫鄂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斗争·····李 琳(348)	
豫鄂边抗日根据地税收工作初探·····苗 键(359)	
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河南部分)研究资料索引	
·····王世云 田亚非(372)	
编后·····(390)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及其特点

刘银生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地方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创建并发展起来的全国敌后三大战场之一。它位于我国江淮河汉之间，东濒大海，西屏武当，南跨长江，北枕陇海路，包括苏皖两省全部和鄂、豫、浙、赣、湘各一部。面积约 50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1 亿。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有上海、南京、武汉、杭州、徐州等中心城市，交通之发达居全国之首。由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所以，这里历来为兵家逐鹿问鼎的战场。抗日战争时期，是敌伪、顽、我三方必争之地。这就使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并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速战速决”、3 个月灭亡中国，分别对华北和华东的淞沪地区展开了大规模全面进攻，妄图一举鲸吞中国。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才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战的正确主张，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八路军已出师华北抗日前线 and 日军已占领上海、南京的形势下，国民党被迫同意将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1938 年 1 月 6 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叶挺任军长，

项英任副军长。根据军部命令，江南游击队集中于皖南歙县岩寺，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江北鄂豫皖边区和豫南桐柏山游击队，集中于皖中霍山县流波疃，编为第四支队。全军共4个支队，10300余人。

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后经整训，即迅速挺进敌后，踏上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正确轨道。这不仅为党保存了一部分经过长期浴血奋战而坚持下来的革命武装，而且为打开华中抗战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新四军集中皖南、皖中之时，正是我军挺进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时机。因为日军占领沪、宁、杭、徐（州）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立脚未稳，特别是对广大江南地区的中小城镇和乡村，更是鞭长莫及，不能完全控制；国民党正规军仓皇向南部和西部山区败退，旧政权瓦解，官吏逃跑，敌后留有很多空虚地带；地主豪绅乘机招兵买马，自封司令，独霸一方；流氓地痞结伙成盗，土匪蜂起，肆以横行；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散兵游勇和丢失的枪支弹药比比皆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群众，渴望组织一支救国家于水火，解人民于倒悬的自卫抗日队伍。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和防范；更由于王明新投降主义错误的严重影响，新四军未能迅速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从而失掉了极为有利的历史先机。至1939年初，国民党开始防共、限共、反共时，我新四军仅只控制了苏南、皖南、皖中、豫皖苏等几小块地区，而“没有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的附近组织起党所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敌后及乡村中的工作特别薄弱或者完全没有工作。新四军的发展还很小，在给养方面很困难，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很危险。华中敌后许多自发的抗日游击战争，很久也没有得到我党我军的领导。因此，我党我军

在华中抗战中所占的实际地位是很微弱的”。^①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新投降主义错误，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地区党的工作；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贯彻实施“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新四军军部传达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为此，第一支队第二团向江北发展，开辟了杨中、大桥、泰州地区；第六团向东挺进，开辟了苏州、太仓、无锡、江阴地区；第二支队第四团活动于太湖、漕湖地区，并向江北仪征、六合、天长地区发展。同时，还发展了皖东、皖北。1939年4月21日，党中央发出指示，强调发展华中的重要性，要求在淮南铁路以东肃清反动武装，建立民主政权。5月24日，指示东南局、中原局，明确我党我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根据地，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开辟苏北，建立后方。为了东进和开辟皖东，叶挺军长渡江北上，赴庐江东汤池，组建江北指挥部，整编江北部队，整顿第四支队领导机关，成立第五支队。整训后，第四、五两支队，挺进津浦路东、西，开展游击战争。时至8月，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为发展皖北，同年6月初，苏鲁豫支队主力一部转入津浦路西，彭雪枫率游击支队挺进淮上，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亦奉命进入邳县、睢宁、铜山地区。几支部队密切配合，共同开辟了皖东北根据地。到1939年底，新四军已在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配合下，先后创建了苏南、苏中、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等6块抗日根据地，胜利完成了在华中的战略展开。

1940年2月，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当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68页。

前的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和坚持游击战争前提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并使之化为民主的根据地。同时极大地发展鄂中、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党中央对发展华中的具体部署是：陈毅部猛烈发展苏北，建立政权，巩固根据地，尤其在江南，要一直发展到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越过沪杭路，直达海边；项英直接指挥皖南的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政权；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阵地，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彭雪枫部要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把这整块地区化为巩固的根据地。为增强华中军事力量，党中央还先后于1939年夏和1940年春，确定调八路军一部南下。

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已将反共摩擦的中心由华北转至华中。3月，李品仙部进攻皖东四支队和江北指挥部，韩德勤部围攻五支队后方机关；6月，韩德勤指使李长江进攻挺进纵队驻地郭村；10月，韩德勤部进攻苏北指挥部驻地寺黄桥。根据军委关于坚决控制淮河、淮南铁路以东地区的指示，新四军先后进行了半塔集、郭村和黄桥的自卫反击战，特别是黄桥反击战，一举歼灭韩顽主力1.1万余人，取得了华中抗战以来反摩擦自卫战的最大胜利。通过反顽自卫作战，巩固了原有根据地，又开辟了苏北盐阜、淮海根据地，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1941至1942年，日寇为把中国变成其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急谋结束在华战争或巩固占领区，稳定中国战局之策。为此，它在极“尽政略和战略的所有手段……竭力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图迅速使其屈服”^①的同时，而将军事进攻的重点

^①《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册，第66页。

进一步指向我敌后战场，使华中抗日根据地遭到了日寇疯狂地“扫荡”和“清剿”。而美、英、苏三国则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国民党“抗战”。国民党顽固派自以为左右逢源，大举反共时机已到，于1941年初，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日、伪、顽又夹击和封锁我华中根据地，使华中敌后军民的抗战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但华中敌后军民在党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新军部的领导下，一面反“扫荡”、反“清剿”，坚持游击战争，坚持阵地；一面加紧进行以减租减息为中心内容的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经过两年艰苦卓绝地奋战，华中敌后军民不仅巩固了原有的各抗日根据地，而且还开辟了浙东新的敌后根据地。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发展到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计9万多人。1943年，又经过1年奋战，华中敌后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新四军发展到12万多人，民兵达60多万，为开展全面对敌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4至1945年8月，华中敌后军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有利形势下，为从战略上连接华北、华中和华南，并准备配合盟军从沿海登陆，按照党中央开辟河南，控制中原；发展东南，控制沿海；挺进华南，造成南方一翼的战略总方针，新四军四师以四个主力团西进萧县、永城、夏邑地区，恢复了豫皖苏根据地，并打开了商丘、亳县地区的局面。新四军军部还先后派粟裕、叶飞分别率领一师各3个团南下苏浙，巩固了苏南和浙西根据地。在此期间，华中军民还开辟了苏浙皖边和湘鄂赣边两个新区。至抗日战争胜利时，华中抗日根据地已形成拥有苏北、苏中、苏南、皖北、淮南、皖中、浙东、豫鄂边、苏浙皖边和湘鄂赣边等10个区。其中，苏北、苏中、淮南、皖北等区已连成一片，从而把华中与山东两大战略区连接起来。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特点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并吸取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经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及华北抗日根据地相比，有着自身的特点。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特点主要是：

（一）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在同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尖锐、复杂、激烈的三角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虽然始终有主要矛盾的中日民族矛盾，同时，又有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诸如国民党与日伪汉奸之间的矛盾、中央军与地方杂牌军之间的矛盾、中央军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日伪汉奸之间的矛盾等等），多种矛盾和斗争互相交织，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但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伪、国民党顽固派三种势力的角逐和斗争，是该区矛盾斗争的基本局面。这种斗争，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虽然同样存在，但由于抗战初期主要是对日伪进行斗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已从华北地区溃退南撤，所剩顽军不多，所以，这里的三角斗争，远不如华中抗日根据地表现的尖锐和激烈。这是因为华中地区是日寇侵华派遣军的指挥中心，是敌人实施西侵、南进的后方基地；1940年3月，它又成了汪精卫伪中央政权的“近畿之地”；同时，它又曾是国民党顽固派经营多年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反动统治的大本营。南京政府退逃重庆后，仍在这里留置了大批军队，用以限共、反共，并企图以后在此重建全国的反动统治。因此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要在这虎穴狼窝立足取胜，就不得不进行两面作战：一方面，要粉碎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日伪的频繁而残酷地“扫荡”和“清剿”；另一方面，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限制”、“经济封锁”、“军事进攻”等一系列的反共摩擦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

争。抗战期间，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先后对日寇和伪军作战19300多次，消灭日伪军31.7万多人。仅在1941年内，就对日伪作战达2390多次，消灭日伪官兵3.3万余人。与此同时，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3200多次，歼顽军14.3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旨在消灭新四军而策划的“皖南事变”的阴谋。因此，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始终都是处在同日伪敌人和国民党顽军的两面夹击中紧张而艰苦地战斗着。正如彭雪枫所说：“在信阳和周口的炮火声中，我们的‘主力’出发了。……从鹿邑北出柘太睢杞，侧敌军行，穿插封锁，几乎无日不在战斗中与行动中。围绕着柘、太、商、睢的敌人，来往于汉奸土匪多如牛毛的地区，我们唯一的决心是‘打’，日以继夜，夜以继日，针对着‘打击’的目标；分散以到处袭扰，集中以各个击破，致使敌人的装甲、坦克，经常迷失方向，骑兵、汽车往往落伍掉队，战士们不愧为‘地上空军’，神出鬼没，给敌人以无限的苦恼！”“一年以来，大小战斗60次，平均每6天即打一仗”，在“紧张激烈艰苦斗争的一年”里，“在敌寇不断的实行着扫荡围攻封锁中，我们报之以反围攻、反扫荡、反封锁”。^①由一斑而窥全豹，华中敌后军民，就是在这样紧张、激烈、艰苦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所以，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华中敌后地区的发展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是经过这样的具体道路：独立自主地实行三民主义与坚决的武装自卫斗争。这是和华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独是在同敌伪的不断战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顽固派的不断自卫斗争中，即是说，是在三角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党在认真地总结了两次历史性转

^①彭雪枫：《斗争一年》，1939年10月5日《拂晓报》。

变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掌握了抗日战争及民主革命规律，借鉴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新鲜经验，并在实践中有了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在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建立起来的。这一时期，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开创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是，这条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并没有被全党所认识，党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也没有统一的理解，结果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抗日根据地，是在中国革命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转变后建立起来的。这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党的路线已经转到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成熟起来。这时，党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能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的实际国情来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也更加自觉了。因此，党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审时度势，为适应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不仅同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这样，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所缔造的英勇红军，及其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红军干部，积累的一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就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华中抗日根据地，又是在八路军先后深入华北敌后，相继建立起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后，才开始建立的。尽管华中敌后的军事基础、党的基础、干部基础、群众基础等都不如华北，然而，有历史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特别是有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新经验，有党中央、中原局和华中局的正确领导，有华中敌后军民的团结一致，就能扬长避短，克服一

切困难，在大江南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正如刘少奇所说：“华中敌后的根据地是在抗战三年以后才开始建立，并且是在反摩擦斗争胜利之后才开始建立的。由于这两个特点，再加其它特点，就使华中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条件，比华北更困难些。然而，我们有了华北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中央的许多指示，我们可以少犯许多错误，可以较快地纠正各种错误。因此，也就使我们在中下级干部较少较弱的条件下，能够运用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迅速恢复敌后抗日的秩序，团结各阶层人民在我们的周围，建设与巩固各根据地，坚持华中敌后的抗日战争”。①

（三）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在不断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严重影响，深入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指示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有着明显的不同。抗战初期，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党中央集中解决了两个方向性的问题：一是将地方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由秘密的群众工作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军队实行军事战略方针的转变，由正规的运动战为主转入分散的游击战为主。既要集中作战，消灭敌人，开辟与保卫根据地，又要分散做群众工作，创建抗日根据地。二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纠正对国民党迁就退让，不敢放手发展人民抗日力量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华北地区的党和军队，在党中央、华北局和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指挥下，主力部队出师后迅速展开于敌之侧后方，协同地方党以大刀阔斧方式，建立政权，组织群众团体，建立民众武装，扩大主力部队。地方党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由城市转到乡村，开展游击战争。在一年多时间内，就先后开辟了10多块抗日根据地，至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华北军民在敌后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87页。

已站稳脚跟。而华中地区的党，由于其主要领导人项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严重影响，不坚决执行党的行动路线和有关指示，没有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的附近组织起党所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没有动员广大青年、干部转向乡村进行武装斗争，仍坚持以城市为中心。所以许多地区开展起来的自发的游击战争，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很久也没有得到我党我军的领导。在统一战线中，不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各种限制、无理摩擦和进攻，只是一味退让和迁就，而不敢作坚决的自卫斗争。如新四军被滞留皖南集中整训，以应付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校阅，并幻想国民党能恩赐一些军事装备等。同时，还过分强调华中的特殊性，说什么平原水网地区无法开展游击战争，华中没有军事干部，敌后情况严重等等，并以此为借口，不敢到敌后活动。因而失去了在华中敌后迅猛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最有利的历史时机。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撤销了长江局，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和以项英为首的东南局。刘少奇在中原局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关于“发展华中”等战略方针，正确地领导和发动了敌后抗战，建立和扩大了敌后根据地，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和党的组织。而项英仍然株守皖南，继续坚持其右倾错误，对周恩来与他共同商定的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犹豫迟疑，不坚决贯彻执行。对敌后斗争力量不仅不加强，而且还搞什么“精兵主义”，限制武装部队的发展。对国民党的无理限制和挑衅行为，一再无原则地迁就和退让，唯恐影响国共团结。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不敢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再次失去了发展华中的较好时机。直到新四军江北、江南指挥部先后成立，并在张云逸、陈毅等领导下，华中敌后抗战局面有了新的转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者项英，还阻挠陈毅坚决执行党中央向东发展的指示，电告陈毅，坚决反对东进。在这种情况下，陈毅不

得不冒着“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命令“江抗”东进。重建新四军军部后，党关于发展华中敌后抗战的一系列指示，才得以全面贯彻落实，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才得以迅猛发展。总之，由于在战略转变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及时指明方向；由于敌后军民在维护党内、军内的团结的基础上，不断抵制和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严重影响，贯彻落实党的行动路线和指示，华中抗日根据地才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四）华中抗日根据地，多建在平原水网和河湖港汊地带，且处于敌、顽的夹击包围之中，其客观环境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更为恶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除洪湖革命根据地是建立在河湖港汊地带外，其它都建立在远离大城市的偏僻山区，而且在地域和规模上都较小。华北抗日根据地，是山地、平原兼而有之，互相补充和支援，是进行敌后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良好阵地。而华中地区，虽有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大洪山诸山脉，但多被国民党军队占据。我新四军和地方游击队只能在平原水网、河湖港汊地带建立根据地。这对开展游击战争带来了许多不便。新四军和八路军一样有着在山地打游击战争的传统与丰富经验，初到华中敌后，对在平原水网、河湖港汊地带进行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习惯、不适应。面对四通八达，缺少隐蔽，无山可据，无险可凭的广阔平原，和敌人梅花桩式的据点和蛛网般的封锁线等许多困难，新四军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思想，一方面认真学习八路军在华北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经验，树立“寇能往，我亦能往”的思想，坚定了在平原水网、河湖港汊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信心。一方面在斗争实践中他们勇于探索和创造，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挥我军优势，坚决冲破敌人的分割、包围和夹击，利用敌伪、顽间的各种矛盾，发展壮大自己，终于建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抗

日大军。经过战术理论上的研究和对实际战争胜利经验的总结，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平原游击战是可以打的。“抗战以来，在敌后平原地带进行游击战的结果，不仅解决了平原地带能否打游击这一问题，而且又在战士们——尤其是往昔的‘山地游击活动者’们的心理上，起了一种‘平原游击似乎较之山地还要舒服些’的变化。原因很简单，由于平原游击周旋容易，运动便利，即是给养也还易于筹措，至于隐蔽，在有的时候有的地方，还较之山地周到些”。^①譬如“有象‘山’一样作为隐蔽的有森林、村庄、溪沟、芦苇、禾苗、青纱帐、起伏地。”只要作好“耐心而艰苦的群众工作”，“成一种草木皆兵的境况”，“游击队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混为一体，成一种到处看不见我们的游击队，然而到处都是我们的游击队”。“敌人孤立，则有利于我们的活动”。“在平原上敌人的机械兵种更易于发挥它的威力，然而我们随时破坏公路改变地形”，当发现敌人时，便立即“四零五分，风流云散”，“经整为零”，“散布于四面八方”。“这种时合时散随打随分的‘麻雀阵’战术，往往给强大的敌人以无限的苦痛与烦恼”。在战术上，他强调“独立自主作战”的精神和作风，按照战术原则独立进行机动作战。并明确指出，“游击战将不为地理的条件所拘限”。^②而“平原游击战的迫切问题”，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只要有巩固的统一战线、切实的军民合作和一致、普遍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合适的政治机构与设施等必备条件，就可以建立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斗争方式，应该是从秘密的和平的组织走到公开的武装的斗争，从小块到大块……从一块到多块，块与块再联系起来，抗日根据地就算初具规模了”。^③彭雪枫关

①彭雪枫：《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八路军军政杂志》1卷6期。

②陆诒：《皖北敌后访彭雪枫》，《解放日报》1940年8月11日。

③彭雪枫：《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八路军军政杂志》1卷6期。

于在地域广大的平原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论述及其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在华中敌后的河湖港汊，特别是在辽阔的平原地带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华中敌后军民的一个创造和发展。它把我军的斗争进一步推进到靠近城市的地方，缩小了农村对城市的包围圈，为最后夺取城市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真正形成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对城市的大包围。从而，大大丰富了我党我军创建根据地的经验。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试论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历史作用

张文杰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同时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签发通知，决定由胡服（刘少奇）、朱瑞（未到职）、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组成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具体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

为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刘少奇、朱理治、李先念等于11月23日，带领中原局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离开延安，奔赴河南，坐镇竹沟，指导中原，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在中原人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一、加强党的建设，使党成为领导中原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

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为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开辟中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十分重视党的建设 work。

首先，特别注意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建党学说武装中原地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在少奇同志主持中原局工作期间，他曾先后写过不少有关党的建设的著作。如《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这些理